

现代社会学文库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变迁与流动

许欣欣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5
279

现 代 社 会 学 文 库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变迁与流动

许欣欣 著



A093643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许欣欣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

(现代社会学文库)

ISBN 7-80149-356-7

I. 当… II. 许… III. 社会结构-研究-中国-现代 IV. D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052 号

·现代社会学文库·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



著 者: 许欣欣

责任编辑: 范广伟 田玉荣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56-7/D·050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以 1978 年末开始进行的农村联产承包制为起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微观领域的局部变革到宏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总目标的确立，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新的一幕逐步拉开。改革的步步推进和深化导致大量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重组。这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以及分配关系的变动不仅引发了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而且引发了并将继续引发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迁，以至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透过变化纷呈的各种表象去揭示与把握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内在本质、运行规律及发展趋势，社会流动研究无疑是个极好的入口。正因此，近十几年来，社会学界频频有人涉足这一领域，本研究将着眼点放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家投入注意力较多的一个研究领

域，也可以说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核心领域。社会流动意指社会成员地位与位置的变化，确切地说，它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与地理空间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化。在社会学研究中，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化。

社会流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著名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 M. Lipset）和瑞哈德·本迪克斯（R. Bendix）对于社会流动现象在所有社会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指出，社会流动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实际需求方面的变化，即随着复杂的社会变迁，或迟或早终将导致占据不同位置人们需求的改变。少数居高位者可能不具备这些位置所需要的能力，但他们往往会排挤那些处于较低位置的有能力者进入高层位置。他们的失败，以及他们排挤有能力者的所作所为，都会造成紧张和对传统声望等级的打击，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社会群体出现。第二，是才能供给方面的变化。就像社会上对天才的需求不断变化一样，天才的供给也经常发生变化。事实上，没有任何精英或统治者能够控制天才、智慧或其他才能的自然分布，尽管可以垄断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因此，只要有許多高能力高智慧的人属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就一定会有一些居高位者来自那些阶层。那些潜在的居高位者发展其才干并进而占据较高位置的机会也许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迟或早总有一些人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既然这些曾是普通人的人能使自己轻易获得新的上升途径，他们通常也将变成向旧的统治

阶层挑战的新群体的核心^①。

社会流动之所以引起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不仅在于其存在的普遍性，更在于其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密切相关。恰如著名社会学家布劳（P. Blau）所云：“不管引起变化的条件是什么，在大多数结构变迁形式中，社会流动过程是一个基本要素”，“社会流动就是社会结构改变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条件的过程。无论是新技术、经济条件还是其他条件产生变化的需要，结构变化几乎总是取决于人们从某些社会位置向其他社会位置的流动”^②。

在任何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分配、交换和转移都是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的。这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其对社会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占有及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无论就个人还是就群体而言，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往往意味着个人或群体社会地位的实现与改变。因此，对社会流动过程、方式、方向、规模、规律以及流动结果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源是如何分配、交换与转移的，这种分配、交换和转移所依据的规则是什么，其结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哪些变化。此外，社会资源分配规则与结果的改变不仅会对社会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的变化。可以说，社会流动构成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① Lipset and Bendix,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② 布劳：《不平等与异质性》（中译本），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广义上讲，社会流动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经济学中的劳动力转移和人口学中的人口迁徙也都可以包括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内。但从狭义上讲，社会学进行的社会流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获得和改变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等问题上。在任何社会中，一个人的地位获得都不只是偶然的，它可能受到个人天生才能、后天努力、家庭背景及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学领域内，社会流动研究又有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之分。

代内流动主要研究社会成员一生中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水平或垂直流动，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人生中的一条运动曲线。代际流动则是研究父辈与子辈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继承与变动情况，探询父辈对子辈地位达致的作用。社会学尤其注重代际流动的研究，这是因为代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变迁的过程与方向。在封闭的传统社会里，一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在其父辈所属的阶级和阶层里终其一生，子承父业，代际之间流动的机会很少，想要有所改变是不可能的；而在开放的现代社会里，情况则完全相反，几乎每个阶级和阶层的大门都是敞开的，代际流动乃属必然。

理虽如此，然而纵观人类历史，完全封闭和完全开放的社会从来不曾存在。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下各种社会不同封闭（或开放）程度所导致的不同代际流动状态，并且，这种种不同的社会流动状态仍然在随着各自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那么，中国目前的社会流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与其他国家或

社会相比，它有哪些特点？近20年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是否导致了与以往不同的流动模式出现？本研究将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即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如袁方先生“士的社会阶梯”、“社会流动与社会选择”等论文。自70年代末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更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中国社会学家独立进行^①或由国外同仁进行的关于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已有不少，^②只是由于经费或其他研究条件的限制，这些研究大都是关于局部地区或局部人群的调查，属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极为罕见，至于采用同一抽样框内不同时点

①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戴建中：“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流动”，见《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陈婴婴：《职业结构与流动》，东方出版社，1995；李春玲：《中国城镇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② P. M. Blau and D. Q. Ruan.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Urban China and Americ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9: 3~32. N. Lin and Y. -J. Bian. 1989. "Status Attainment in a Chinese Labor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Atlanta (August 1988). N. Lin and Y. -J. Bian. 1991. "Getting Ahead of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657~688. W. L. Parish, 1981. "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 *Problems of Communism* 30: 37~53. W. L. Parish,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pp. 84~120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 K. Whyte and W.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的全国性样本进行比较流动研究则以本研究为首例。因此，希望本研究能作为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历史性记载，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比较的基础。

第二节 研究假设、方法及资料来源

1. 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主要围绕以下两个基本假设展开分析。

①制度假设。即，在中国，社会流动受制度（或体制）因素的影响更大于发展因素。工业化理论假设在工业化社会中，经济关系已经从其他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社会流动将主要决定于技术发展状况，它独立于其他条件，如政府形式、经济体制、民主制度，以及是否精英统治，等等。同时，技术发展状况还将导致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在工业化社会中，财富和职业在社会地位的决定过程中比出身和血统更重要，先赋地位逐渐被自致地位所代替，封闭性的社会分层体系将趋向开放（Lipset and Zetterberg 1959；Hauser and Featherman 1977；Hope 1982；Popenoe 1983）。本研究将通过影响人们流动机会、流动方向及地位获得的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分析对上述理论提出反证。藉以说明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过程并非仅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政治经济制度对社会成员流动与地位实现的作用举足轻重。

②部门分割假设。即，通行于世界的以职业地位作为

个人地位达致目标的分析模型并不适宜于中国，在中国，人们工作单位所属部门所有制性质的影响至关重要。现代化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导致了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生产组织和工作场所日益取代家庭而成为个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于是，诸多标志个人在生产（或工作）组织中之身份与地位的职业也就成了个人最主要的社会地位标志（Inkeles 1966；Peponoe 1983）。在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中，职业流动几乎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代名词，尤其是 1967 年布劳和邓肯的“地位实现模型”推出后，他们用于为职业评分的综合社会经济指数（SEI）已经成为社会学家评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尺，历久不衰。虽然也曾有人指出“地位实现模型”的解释力有限，应对 SEI 这一指标的有效性提出质疑（Turner 1984），但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不过是增加一些介入变量，或仍用同样变量，只是采用另一种测量方法意图解释一些附加方差而已。本研究将通过所有制部门变量的引入说明在中国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所有制部门往往比获得一个好职业更重要。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本上属于一项宏观的实证研究。在社会学的众多研究领域，社会流动研究可说是量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领域，尤其是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推广普及和各种统计软件包功能的日益完善，近几十年来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几乎全是定量研究，而且都使用复杂严谨的统计方法。正如艾瑞克森（Eriksön）与戈德索普（Goldthorpe）所

云：事实上，现在对于流动研究的学生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知道如何在大量向他们开放以及被各类信徒们热情推荐的技术中进行选择。^①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流动乃是一种内在的数量现象，比较容易用统计方法进行处理——无论是简单的统计描述还是各种正式模型的建立。特别是自布劳和邓肯合著的《美国职业结构》（1967）一书首次将路径分析法用于构筑其“地位实现模型”以来，社会学界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即如果不使用较复杂的统计方法对一定规模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则很难把握社会流动的真实面貌。

鉴于此，本研究将采用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流动表分析和路径分析方法进行中国代际流动与地位实现的定量分析。

3.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天健博士1990年在中国所做的“人的现代化”课题调查数据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安德鲁·J. 内森（Andrew J. Nathan）与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史天健1993年9月至1994年5月在中国进行的“社会变迁与社会意识”课题调查数据为主。两次调查均在同一抽样框内选样。整个抽样设计属于严格的概率成比例抽样（PPS），调查样本总体范围界定为除西藏自治区外的全国29个省、自治

^①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区、直辖市，采用4级分层随机抽样法选样。首先，以县、市、市辖区为初级抽样单位（PSU）选样140个。然后，以乡和街道为次级抽样单位（SSU），抽样280个。第三步，从这些乡与街道中抽出560个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第四步，抽选家庭户。样本的最后确定由访问员入户后根据统计学家莱斯利·凯什设计的选样表完成。所选样本为年满18周岁以上有独立回答问题能力的中国公民^①。全部调查数据通过问卷形式进行收集。1990年的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896份，1993年回收有效问卷3287份。笔者自1993年6月至1994年5月参加了第二次调查的全过程。

虽然两次调查都属于政治学调查，问卷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围绕公民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情况设计而成，但在自变量部分有关被访者个人及家庭情况的设计也很详细，如：被访者本人、配偶、父亲及母亲的职业、政治面貌、教育程度以及家庭人口、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均包括在内。因此，用此数据进行社会流动分析是完全可行的。

当然，由于毕竟是政治学调查资料，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也是存在的。首先，社会流动研究中常用的个人最初职业与个人收入变量在问卷中没有反映，因而在分析中造成了与国际上通用模型进行比较的困难，致使本研究在进行流动表分析时不得不放弃代内流动分析而局限于代际流动研究范围内；其次，一些重要变量的缺少造成了分析难度

^① 本研究所选样本界定在18~69岁范围内。

与工作量的增大，在整个数据分析过程中常常难免削足适履的感觉。此外，由于两次调查均为严格的 PPS 设计，最后一级的选样单位是居民户，而且调查对象的最后选定以访问员入户时的家庭实际居住人员为准，而不是以户口簿上的注册人员为准，因而使得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民工潮”的大量农村流动人口未能包括在样本内，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然而，由于经费、时间及其他种种条件的限制，所有的不足与遗憾只能留待今后的研究予以弥补了。

第二章 社会分层与社会 流动的理论 与研究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乃是一体之两面，流动本身即意味着有一个不平等的阶梯存在，而这不平等的阶梯即是社会分层的具体体现。显然，研究社会流动不可能不涉及社会分层。因此，首先应对社会分层的有关理论与研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第一节 社会分层理论与研究

对社会阶级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和对社会思想的研究一样悠久，从西方哲学诞生之日起，富有思想的观察家就已认识到了社会分层的重要性。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中，有关社会分层的论述随处可见。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探讨了一个真正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并认为家庭是不平等（即社会分层）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个体的动机即在于为家庭的其他成员及其至爱亲朋谋得他们所能享受的所有特权——这一点至今仍为许多当代社会学家所赞同。因此，每一个社

会都存在一种要求通过使不平等世袭化从而使不平等制度化的内在压力。为缓解这种压力并最终消除社会特权的继承趋向，柏拉图提出了他的构想。他认为，创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惟一方法就是把孩子从其父母身边带走，由国家来培育他们。

此外，柏拉图认为，社会是放大的个人，有其固定的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他指出，人的灵魂有三种：①理性；②意志；③情欲。与其相对应，人也分为三类：①陶冶理智与追求真理者——哲学家；②追求荣誉和成功者——武士；③追求感官欲望之满足与身体享受者——农人与工匠。这三类人分别构成社会的三个等级。社会的第一等级是哲学家，他们的身体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他们是社会的统治者，通晓“善”的理念和治国的哲学，其德性是智慧，其责任是领导和管理全部的社会生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哲学王。社会的第二等级是武士，他们的身体是神用银子做成的，他们的责任是保卫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对内维护治安，对外防御侵略。武士是哲学王的辅弼者。社会的第三等级是农人和工匠，他们的身体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的责任是专门从事生产劳动和经营商业，供养国家的统治者和保卫者。农人、工匠多欲望，所以节制是他们的德性。至于奴隶，柏拉图没有把他们当成人看，而是将其排除在社会等级结构之外。柏拉图认为，这三个等级各就其位，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责，从而构成社会的合理的阶级结构。凡是具有这种阶级结构的国家，一定是“和谐一致”、“正义”实现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劳心与劳力的等级划分乃是上帝的命令，这种划分

绝对不能随意改变。不过他认为，阶级之间还应保持一定程度的流动，即如果统治者的子女不合作统治者，就应降为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的后代中出现了适于做统治者的优秀分子，就应提升为统治者，这便是柏拉图的“阶级转换说”。^①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社会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起源经历了三个自然过程：①家庭；②村坊；③城邦。城邦形式最终实现了社会至善的本性。亚里士多德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社会的起源，把社会看成是自然生成的东西，而不是契约或意志的产物。他对社会进化和社会本性的论述比柏拉图更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他认为，从财产的拥有量上看，任何城邦社会的居民都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即富有阶级、贫穷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三个阶级中，中产阶级最富于善德且极少野心。中产阶级处于“毋过与毋不及”的最佳地位，所以它最能顺从理性，不走极端，具有节制和中庸的美德。富有阶级往往“逞强放纵”，“致犯重罪”。贫穷阶级则“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富有阶级和贫穷阶级各趋极端，放弃理性的引导，是城邦社会的最大祸患。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之中由中产阶级执政，可以避免党派纷争并使人们过上无限幸福的小康生活。他还指出，历史上的最优秀分子均出身于中产阶级，如梭伦、莱喀古士、嘉隆达斯等。^②从人的自然本性上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

① 侯均生：《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第64～6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204～208页，商务印书馆，1965。

邦居民可以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主奴之分完全决定于人的天赋和禀性，主人富于统治才能，奴隶富于顺从的天性。主奴关系是自然命定的秩序，不能变动。他认为柏拉图的“阶级转换说”违反自然秩序，这种转换将给社会带来危害。^①

虽然关于社会分层的讨论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时代，但真正有系统的社会阶层理论探讨却始于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其后的大多数理论建设工作或重复其尝试，或重新阐述其思想，或对其思想提出反驳。恰似著名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所云：“如果谁要把社会阶级研究之父这一桂冠授予某一个人的话，那么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②

1. 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社会阶级的起源、内涵与发展。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并无阶级之划分。然而，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社会阶级已呈现无遗。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时代都拥有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一个统治阶级，一个被统治阶级。由于每一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不同，社会阶级的展现方式亦不相同。马克思对经济学、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使他确信：社会主要由经济组织构成，社会阶级构成了经济事实与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52页。

②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中译本），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